

《书于竹帛》的诞生：学术出版视域下北美汉学与图书馆学之互动^{*}

肖 鹏 陈润好

摘 要 本研究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档案为中心,第一次细致梳理并重现《书于竹帛》的出版过程,包括荐稿、审稿、预算设计、排版印刷、发行与宣传、销售与反馈等诸多环节。《书于竹帛》的诞生得益于北美图书馆界和汉学界的合力,但其成功与北美汉学发展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书于竹帛》与同时期汉学著作的出版和发行历程,反映了北美汉学转型与发展对学术著作出版的影响,呈现出 20 世纪 60 年代前后的北美汉学发展与学术著作出版之间的互动。以出版史与书籍史的视角透视学术史,《书于竹帛》有着作为学术史载体的崭新价值,这为图情领域的史学书写提供了新的思路。参考文献 40。

关键词 钱存训 书于竹帛 汉学研究 图书馆学 杨联陞

分类号 G259.19

The Birth of *Written on Bamboo and Silk*: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China Studies and the Library Science in the Perspective of Academic Publishing

XIAO Peng & CHEN Runhao

ABSTRACT

The research not only tries to explore the new value of the book, *Written on Bamboo and Silk*, as a carrier of an academic history, but also intends to bring in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e history-writing of books and libraries. Based on the archive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for the first time, the article presents the details of publishing *Written on Bamboo and Silk*, including the process of recommendation, review, design, printing, publishing and sales. In showing above details, the paper discusses different questions: How was the book accepted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How does the doctoral dissertation of Tsuen-Hsuei Tsien become the known piece of *Written on Bamboo and Silk*? How to print a book with Chinese characters in Western countries? How to promote and sell an academic work? etc. The birth of this book no doubt should give the credit to the library circle and China studies circle in North America. Important figures from both circles are involved and play different roles in the publishing process, such as

^{*}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北美华人图书馆员共同体的身份认同研究(1927—2015)”(编号:15ATQ002)的研究成果之一。(This article is an outcome of the project “Cultural China: the Identity of Chinese Librarian Community in North American (1927–2015)” (No.15ATQ002) supported by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通信作者:肖鹏,Email: xiaop25@mail.sysu.edu.cn,ORCID: 0000-0002-6668-8122 (Correspondence should be addressed to XIAO Peng,Email: xiaop25@mail.sysu.edu.cn,ORCID: 0000-0002-6668-8122)

Howard W. Winger and Herrlee G. Creel as the referees, Carroll G. Bowen as the editor, Lester Asheim's financial assistance and especially, Lien-sheng Yang as the significant peer reviewer. However, the success of the book has closer relationship with the academic group of China studies. The birth of *Written on Bamboo and Silk* and relevant monographs, such as Kung-chuan Hsiao's *Rural China: Imperial Contro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reflect the influence of China studies' development and transition at the time. Behind *Written on Bamboo and Silk*, we could see the revival of China studies and its expending network around the 1960s. In order to support the rise of China studies, there comes the needs for books or monographs, which could be used as textbooks for the growing student group of China studies, pushes western publishing system to accept the Chinese characters and builds a communication and exchange circles of China studies. 40 refs.

KEY WORDS

Tsuen-hsuei Tsien. *Written on Bamboo and Silk*. China studies. Library Science. Lien-sheng Yang.

0 引言

您的眼前是一本书。

在这本书的封面上,作者的名字最是显眼。但这本书以现在的模样而不是其他的形式出现在您面前,不仅仅得益于作者,同时也和编辑、评审专家、出版者、印刷商、封面设计者以及读者息息相关。进一步来讲,一本书的诞生绝非浑闲事,冥冥中被社会和文化要素所牵引,反过来又成为社会和文化的变革动因(Agent of Change),一切皆非偶然。沿着这一思路,英美分析目录学、年鉴学派及当代新文化史重塑了书籍史的写作范式,也大大拓宽了图书馆学、出版学的研究视域。本文对钱存训先生《书于竹帛:中国古代的文字记录》(下称“《书于竹帛》”)成书过程的讨论,便是在这样的视域下展开的。

选择《书于竹帛》作为本文研究对象有特殊的原因。该书是第一部由图书馆人撰写的,对

欧美汉学圈^①与世界范围内的书籍史研究均产生持久影响的著作。无论在学术评价、书籍销量抑或社会认知层面,《书于竹帛》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自然,这首先归功于其作者钱存训先生,然而,正如上文所言,一本书的影响并非简单取决于它本身的学术价值与思想内涵。在崭新的书籍史与出版史视域下,许多值得探究的问题尚未引起学界的关注:《书于竹帛》如何从博士论文变为经典著作?钱存训先生东亚图书馆学者与汉学学者的双重身份,与《书于竹帛》的成就有何关系?有什么人物参与到《书于竹帛》的出版过程之中?该书的成功与宏观的时代背景、欧美汉学学术史的进路有何关联?它对图书馆人的学术取向与学术使命又有何启发?

多年来,关于《书于竹帛》的讨论不少,但一手资料的发掘却相当贫瘠,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以上话题的展开。2016年,笔者在芝加哥大学发现与《书于竹帛》出版过程相关的一系列信件、表单和剪报,内容涉及该书的推荐、审稿、修

① 关于北美汉学、中国学、中国研究等概念的界分问题,学界争议颇多,近日程焕文师又有讨论(见:程焕文.论燕京大学图书馆在美国中国研究中的历史作用——《图书馆、出版与教育:哈佛燕京学社在华中国研究史(1928—1950)》序[J].大学图书馆学报,2018(5):101-106.)。本文并不试图介入这一争论,笔者的基本观点是,尽管汉学更侧重古典研究,中国学或中国研究更侧重对近现代中国的探索,但不同时期、不同学术社群的研究重点自然有很大的偏移,即便衣钵传承,亦绝无固守不变之理。在本文中,为便于讨论,对于相关研究和社群,统一以“北美汉学”“北美汉学圈”指称。

改、排印、发行等诸多环节。依据这些资料,我们有望清晰地追溯《书于竹帛》的出版流程,了解该书的诞生经过,也为以上问题的求解提供了可能。在勾勒《书于竹帛》诞生过程的基础上,笔者尝试窥探 20 世纪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北美汉学的研究转向。这一工作更深层的目的,是以学术实践的方式回应此前笔者文章中提出的图书馆史研究困境^[1],为图书与图书馆史领域提供新的话语可能与发展空间。

1 荐稿

鉴于钱存训先生的身份和经历已为学界所熟知,限于篇幅,本文不再赘述。在记录钱存训先生经历的相关材料中,最值得留意的是其个人自传。传记中,他对于将博士论文《印刷发明前的中国书和铭文的起源和发展》(下称“《印》文”)修改为《书于竹帛》出版的过程,有以下的描述:

“一九五七年博士论文完成后,获得图书馆学院院长推荐交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而当时美国的中国研究还是冷门,对这一部主题偏僻的著作,出版社认为销路有限,不愿接受。因此,我将论文内容加以修订,改名《书于竹帛:中国古代书籍和铭文的起源》……经校内外专家的审查推荐,院方并愿补助印刷费九千元的三分之一……最后出版社决定接受,收入‘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研究丛书’”。^{[2]53}

这段简单的描述显然无法回答本文开篇时提出的诸多重要问题,事实上,对照芝加哥大学出版社所存档案的记录,出版过程中的某些事宜或许连钱先生本人也不太了解。严格来讲,该书获得出版社青睐的转折点发生在 1960 年底,主要得益于钱存训博士论文的两任指导教师霍华德·温格(Howard W. Winger)与顾立雅(Herrlee G. Creel)的推荐与斡旋。

温格教授曾担任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研究生院的教导主任和院长^[3]。1960 年 10 月 25 日,温格致信著名出版人、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的

卡罗尔·G·鲍恩(Carroll G. Bowen),建议他将钱存训的博士论文列入“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研究丛书”的出版计划。温格教授在信中评价道,“它不仅是一部优秀的学术著作,更填补了早期书写史的空白。我认为此书将成为图书馆学校标准参考读物”^[4]。有意思的是,温格既已在信件正文中大力称赞钱存训的书稿,仍担心鲍恩不明其意,特在信末手书附言曰,“直白点说,我们认为该书非常值得出版”^[4]。与此同时,顾立雅教授亦于 1960 年 10 月 27 日致信鲍恩,认为“……这是本领域迄今为止最好的研究。应当通过各种方式促成此书的出版”,并指出“在中国书籍研究这一领域,钱存训先生是最为权威的专家”^[5],其后,顾又帮忙提交稿件、推荐审稿人,出力尤多。

20 世纪 60 年代,欧洲与北美已然形成一套比较成熟的学术出版机制。学术著作的出版要经过严格的初审、再审、排印、发行等诸多环节,书稿获得推荐并达成出版意向仅仅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1960 年 11 月 1 日,鲍恩顺利收到顾寄去的《印》文,正式承担该书的编辑工作,意味着这第一步刚刚迈出。但这样的开始具有相当的象征意义。霍华德·温格代表了图书馆(学)的圈子,顾立雅的参与则反映了汉学研究社群的参与。可以说,图书馆与汉学研究两个场域的资源一直支撑着《书于竹帛》“诞生”的全过程,回过头来,《书于竹帛》也成为我们观察这两个场域的重要切入口。

2 审稿

被推荐到出版社之前,《印》文作为一篇博士论文,已然经过业内不少专家学者的审阅^[6],除上文提及的温格、顾立雅之外,还有柯睿格(Edward A. Kracke, Jr.)教授、傅路德(Luther C. Goodrich)教授、Kenneth Starr 博士等人。柯等三人均是当时汉学或东方学研究的知名人物,他们的部分意见,也被一并送到鲍恩手中,如傅路德早在 1958 年就对钱的博士论文做出如下评语

“我认为它……结构合理,文笔流畅,资料详实……其文本或插图都应当作为图书出版”^[6]。

尽管如此,收到稿件后,鲍恩仍组织了一位大学教职员和一位外部专家进一步审阅书稿。出版社的评阅人罗杰·汉考克(Roger Hancock)首先拿出一份审阅报告^[7],该报告对全书做了综合评价,认为该书写作仔细严谨,对中国书写材料的描述十分精确,甚至“过于精确”。在汉考克看来,该书主要的不足便是“对细节描述和参考文献使用的过于泛滥”。此类意见如今看来或许不可思议,但在当时的环境下,汉考克的观点恐怕算不得偏见。某种程度上,这一力道不重的批评背后,恰恰反映了战后汉学研究崛起时期美国学术出版界与汉学研究者对汉学著述的不同定位。

为了更清楚地阐释这一问题,笔者引入华盛顿大学著名政治学教授萧公权(Kung-chuan Hsiao)的代表作《中国乡村:论十九世纪的帝国控制》(*Rural China: Imperial Contro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下称“《中国乡村》”)的出版经历作为类比案例。该书与《书于竹帛》在同一时期进入出版流程,出版后同样大获成功、影响巨大,作者亦同系华人学者,两者的出版经历在某种程度上可互为观照。《中国乡村》出版前的一个评审意见与汉考克的评述颇为雷同,即“篇幅太长,建议作者削减,并将书中引用的许多原始资料一概删除,由作者简述其大意”^{[8]214}。对此意见,萧公权反驳道:“这是一部‘开荒’的初步著作……这些资料的绝对多数从中文书籍中斟酌摘录,一一注明出处,译成英文,以使读者稽考、覆按或引用……我在书中也提出了若干论断,同时把论断所据的资料一一列入,以便读者判定我的论断是否正确。”^{[8]214}如果说以汉考克等为代表的评审人更重视著作本身的流畅度与可读性,那么,萧公权将《中国乡村》视为“开荒

式”著作的定位,则带有其时汉学学者的敏感和担当,这与钱存训撰写博士论文时的心态是十分类似的。《书于竹帛》的写作初衷,正是要“对印刷发明前的中国图书和铭文加以系统的介绍,作为西方学者研究书籍通史的参考”^{[2]53}。汉学界对开荒式著作的需要,无疑与20世纪50年代中期北美当代汉学研究的体制化(有学者认为其标志即是“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建立”^{[9]272})、60年代后汉学研究大规模兴起的背景有密切关系。

尽管存有负面意见,但汉考克对《印》文的总体评价依然很高。因此,鲍恩很快给顾立雅回信表示对出版该书的兴趣,并请他推荐审稿专家^[10]。顾立雅为他推荐了哈佛大学的杨联陞(Lien-sheng Yang)教授和赖肖尔(Edwin O. Reischauer)教授^[11]。鲍恩的第一选择是赖肖尔^[12]。由于赖当时正在亚洲工作,无暇顾及,代理燕京学社的白思达(Glen W. Baxter)借此提出有一位“更好的读者”,再一次推荐了杨联陞教授^[13]。于是,出版社于11月29日致信杨联陞,邀请他评审钱存训书稿^[14]。杨联陞欣然同意,并在一个多月后完成了审阅任务,于次年1月10日向出版社提交了审稿意见^[15]。笔者曾在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翻阅杨联陞日记^①,发现他在1960年12月27日的日记中记道“看钱存训书稿,毕其大半,大体结实”^[16],可见他对《书于竹帛》颇为认同。

杨的审稿意见以英文书就,于1961年1月6日完成,共计3页。在这份评审意见中,他称赞书稿资料翔实、内容丰富,正与汉考克的批评大相径庭,又提出该领域目前尚未有能与之媲美的研究,判断该书出版后将受到中国文化与文明等领域学生的欢迎^{[17]1}。在肯定该书的价值之后,杨联陞又逐条列出书稿的问题和不足,

① 杨联陞日记原件存于我国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据传其学生陆惠风拟为给他撰写传记,因此影印留有复印稿。陆后来因故离开哈佛,该复印件也因此放置在哈佛燕京图书馆。该份日记尚未出版,其基本情况和记述内容可参见葛兆光教授的相关文章,包括《“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一九七七年杨联陞回国记》《重读杨联陞日记——因为不那么郑重,反而更有意思》等。

大致可归为3个方面:①28处人名、地名的拼写错误。如23页顶部“Huan-nan”应为“Huainan”^{[17]2}。②8处内容错误。如杨认为115页关于汉武帝发现18块玉简的论述有误,指出这个故事说的是汉武帝发现一块上书“十八”二字的玉策,寓意其统治可延续18年之久^①;又如,154至155页中,原文认为“写在特殊载体所制版片上的法律或法令,也称作fan(中文当为‘范’,本文作者注)”,但杨觉得“这一定义仍有待深究,考古学家们一般将‘范’定义为‘铸模’”等^{[17]3}。③除上述问题之外,杨还向钱存训推荐一系列来自法国、日本和中国大陆的参考资料以补充书稿内容。该份审稿意见虽仅3页,却十分细致,带有杨联陞的书评风格。对于引用错误的史实,杨直言不讳;而对于未有定论的地方,则谨慎表述个人意见,并不全盘否定作者的提法。审稿环节以杨联陞评阅意见的出炉而结束。显然,从上文言及的两大支撑场域看来,在这一阶段,汉学研究的圈子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

3 预算设计

《印》文的学术价值既已获得认可,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开始综合考虑图书出版预算、吸引度和图书受众等方面的问题。事实上,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在收到书稿后,很快就对稿件做了一个基本评估,认为其受众可以包括中国史学生、历史学家、图书馆员、目录学家和考古学家,等等^[6],但是这样的受众面在他们看来依然狭窄。为此,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就该书的出版费用与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研究院进行了多次交涉。

1961年3月21日,鲍恩致信时任图书馆学研究院院长的艾西汉(Lester Asheim)教授,信中

列出钱存训书稿出版的费用明细,预计总费用将达4798美元,明确提出希望学院资助其中高达3404美元的制版费用^[18]。4月7日,鲍恩又致信艾西汉,提出初步的出版预算与销售方案:拟定价码洋10美元,第一版印刷1000册,由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研究院负责出资三分之一,每售出一本书,学院可获得其中三分之一的收益。按此计划,出售完第一版的1000册以后,出版社与学院将收回成本。如果销售情况良好,可在1000册的基础上加印,作为作者,钱存训将在销售第1001册时开始获得版税收入^[19]。

艾西汉教授遂于4月10日告知钱存训,学院与出版社协议将该书列为“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研究丛书”之一,根据鲍恩的方案提供出版资助^[20]。钱存训于4月13日回信,大致同意出版社的预算方案,但希望图书出版后定价不要过高,以保证其吸引力,建议可以通过减少脚注、附录、将多个插图排列在同一版面、平版印刷等方式降低成本^[21]。同日,钱存训致信鲍恩,表示自己正在修改书稿题目和相关内容,试图对写作风格等进行调整,以吸引更多广泛的读者群体^[22]。

这一阶段关于书稿印刷成本、内容、题目的反复商讨,反映了该书在当时的出版阻力,出版社只能通过减少印刷量进行成本控制,作者也需要做出妥协,让图书内容与题目更符合大众口味以增加销量。幸运的是,《印》文的重要特色,包括对细节的描述、注释、插图等并没有消失。到1961年8月,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主任Shugg正式提供出版合同,钱存训也在此前后提交了新的书稿,此时,书稿题名已经正式敲定为我们熟知的《书于竹帛》^[23]。

① 后来的《书于竹帛》在此处虽有差异,但大致所去不远。如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本,即是引东汉泰山太守应劭《风俗通义》中的记录,写道“传说汉武帝曾在泰山得一玉策,能知寿数的长短,上书‘十八’二字,但倒读为‘八十’”。概言之,与杨的意见略有差异。仅从此例也可看出,钱存训在后来修改中当然也不是一概接受,不再多加考证。此类议题较为零碎,下文不再赘述。见:钱存训.书于竹帛:中国古代的文字记录[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64.

4 排版印刷

书籍出版过程中的推荐、审稿与修改等环节,由于与学术史联系紧密,多为学人所关注,但其中的排版印刷一环,偏属流程化作业和技术史范畴,往往被人忽略。可是,就《书于竹帛》的案例来讲,因所处的时间、空间颇为特别,其排印环节实有值得讨论之处。

1961年,钱存训正式提交定稿前后,出版社和承印商英国威廉·克洛斯父子有限公司(William Clowes & Sons Ltd.,现归入CPI集团,下称“威廉公司”)[24]敲定了包括用纸、行距、两侧缩进字符、目录、页眉、用纸数量等一系列印刷细节[23],并在此过程中解决了若干印刷难题。

《书于竹帛》遭遇到的印刷困难,既有一般性又有特殊性。所谓“一般”之难,是当时北美汉学著述经常遭遇的汉字印刷问题。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常出现美国印刷厂无法承印“中国字”,只能在欧洲、日本等地印刷的情况[8]215,这或许也是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一开始就选择英国公司的原因。但如果遇到特殊的罕见字,英国印刷商也无能为力,只能到香港专门定制字型[25]278。如此一来,不仅价格昂贵,时间上也颇为蹉跎。由于《书于竹帛》书后有相对复杂的汉字附表,这一问题又再次摆到印刷公司面前。最终,威廉公司处理《书于竹帛》汉字排印的方法,是为每字预留11磅乘以14磅(3.8797毫米乘以4.9378毫米)的空间,再请钱存训将中国字誊写于清样上[26-27]。这当然不是最理想的做法,但比起专门制作字模,无疑又要方便许多。至于“特殊”之难,则来自图版。钱存训为了提高《书于竹帛》的可读性与可用性,在书中添增不少图版,由此导致排印难度和费用的提升,但为了阅读效果,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并没有将图片与文字压缩在同一个页面,而是坚持单页独立排印每个图版[28]。幸运的是,由于海外印刷与纸张的成本比一开始的预算案要低,这一坚

持并未导致超标,图书的最终定价甚至比原先的设计低了四分之一[29]。

在出版社与出版承印商就书稿的编排问题来回交涉的过程中,可以看到,尽管在汉字、图版等方面都遭遇一些困难,但当时的印刷技术与跨国出版协作已十分发达,资金与市场一旦敲定,汉字排印之类的问题不外乎技术末节。

5 发行与宣传

《书于竹帛》定于1962年8月21日发售,而该书的宣传工作早在发行前便已开始,以保证出版后能够顺利进入目标受众的视野。早在1961年8月,出版社就请钱存训在《作者调查表》中列出可能会对该书感兴趣的书店、可以将该书作为参考材料的课程、可以刊登本书书评的报纸杂志和学术期刊,同时还包括一份可能扩大该书影响力的人物名单,以便于向其赠送图书[30]。钱存训对于这份《作者调查表》的填写非常细致。他给出的名单基本覆盖了当时北美书籍史与汉学研究的关键人物(如纽约公共图书馆的Karl Kup、哥伦比亚大学的蒋彝教授等)和重要学术组织(如美国东方学会、美国图书馆协会等)。出版社还设计了一份《出版进度表》[31],梳理名单用以赠送图书、扩大影响。该名单包括且不仅限于多伦多大学出版社的Marsh Jeanneret、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的Leon Anderson等出版界的重要人物,还有《图书馆杂志》《出版人周刊》等与本书相关的重要媒体,后来又进一步扩展到我国台湾地区。

图书出版前后,出版社营销经理布鲁斯·雷顿伯里(Bruce Rattenbury)正是根据以上信息,致信Karl Kup、蒋彝等多位学者,通过赠书方式邀请他们为该书撰写书评。此外,出版社还通过不同方式积极开拓国外市场,如国外销售部Marry Arthur就曾向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伦敦分部经理Trevor Brown推荐可行的销售和推广渠道[32]。出版商也极力向荷兰[33]、法国[34]的相关书店发出广告宣传,争取扩大该书的销售

范围。

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的成功本不在出版社的预见之内,出版社投入的资源恐怕也颇为有限。即便如此,相关人士仍用心用力,钱存训亦做出周全考虑。这些扎实的工作充分调动了图书馆(学)与汉学研究两个圈子的潜在资源,为《书于竹帛》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6 销售与反馈

发售之后,《书于竹帛》的成功远远超出了出版社的预料。同一时期或更早之前,也有颇受美国读者欢迎的汉学学术著述。再以同时期的《中国乡村》为例,据说其“颇承读者赞许,不久出售一空……各处催问再版”,重印也是六、七年后的事情^{[8]215}。《书于竹帛》的成绩或许还要好于《中国乡村》,当时有报道提到“仅3个月时间该书就已售出超过一半”^[35](这个说法与钱存训传记中的提法有一定偏差)。到1963年1月23日,初版后仅约5个月的时间,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就已提出加印1000册的要求,在送货单上,更是写明“越快越好”(ASAP)^[36],可见该书在销售上的成功。

《书于竹帛》在学术界同样博得一片好评。兰乔蒂(Lionello Lanciotti,钱存训的传记中译为“蓝柯地”)、蒋彝、傅路德、李约瑟(Joseph Needham)、恒慕义等一大批著名学者相继在《哈佛亚洲研究》(*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亚洲研究学报》(*Journal of Asian Studies*)等期刊上发表书评。关于这些书评的引述很多,这里不再赘述,唯一值得一提的是意大利汉学家兰乔蒂的评论,他说道,“本书的作者钱存训,既是汉学家又是一名图书馆员;因此,在印刷术发明前的书写和书写载体传播史这一领域,他是最有资格做出深入研究的人。”^[37]此前,几乎没有其他学者从这个角度注意到钱存训教授介入中国书籍史研究的正当性和合理性。而他的评述也恰可引出本文的结论性观点,即:《书于竹帛》的成功,自然与北美发达、专业的学术出版机制密

不可分,但本质上是得益于北美图书馆(学)圈与汉学研究圈的合力推动,而当时处于扩张期的汉学学术圈更是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7 《书于竹帛》如何诞生:学术史视域下的重新审视

前文大致通过荐稿、审稿、预算设计、排版印刷、发行与宣传、销售与反馈等多个流程,较为完整地勾勒了《书于竹帛》的“诞生”过程。最具象征性的是,在该书最初的两名推荐人中,温格代表图书馆圈的力量,顾立雅则来自北美汉学圈(他同时也是芝大远东图书馆的负责人);在计算预算与讨论出版方案时,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研究院为其提供了直接的资金资助,其首要的读者受众群又主要是北美汉学研究的学生、学者;在发行、销售、书评等环节,图书馆人、汉学家以及同时具备这两种身份的学者更交替出现在各个名单上。《书于竹帛》的成功,是一个偶然的个例,但它背后也有必然,即得益于当时北美图书馆圈与汉学圈的共力与互动。

可是,要真正理解《书于竹帛》的出版与成功,还是要将其安放在北美汉学研究兴起的语境之下。尽管钱存训提及当时“美国的中国研究还是冷门”,但自20世纪30年代汉学作为一个学科进入美国大学课堂,它就逐渐走上建制化的道路^{[9]211},从1954年到1960年代初,北美汉学研究的大环境又进一步发生变化:“麦肯锡主义”浪潮的阴霾渐散,东亚区域研究尤其是中国研究正迅速走上学科化与建制化的道路,这两者呈现出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费正清曾直言不讳地指出“就中国问题而言,对付麦肯锡主义的办法只能是办教育”^{[38]433}。尽管二战后华人学者的压抑情状为学界所共知,但到了1960年代前后,美国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群体、专门研究中国的机构数量、图书馆中文书刊资源、中国问题的研究生人数,还有中国相关的学术著作等均有较大增长^{[39]301-302}。同一时期,“多元化学科研究”被引入汉学研究与管理,美国

汉学的视域和范畴越渐扩大,成为汉语、中国文化、历史、文学、社会学和宗教等诸多研究的“十字路口”^{[9]39}。在这一期间诞生和出版的《书于竹帛》,可以说占据了“天时”——这种“天时”不仅仅是看似“虚无缥缈”的政治环境和乐观的学术氛围,它直接为相关著作的出版带来了多方面的优越条件。

(1) 扩大的学术圈提升了北美对汉学著述的需求量,尤其是对具有教材功用的开荒式著述的诉求。这一时期,在美国宏观的战略要求下,区域研究教育与汉学研究日益勃发,这促使北美汉学研究的学生群体与学术社群逐步扩大,在此背景下,开荒性质的汉学著作具有很大的学术和市场空间。以费正清为代表的汉学教育者和以萧公权为代表的华人学者,均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缺口,他们在编写教材、撰写著作时,都自觉或不自觉地为读者提供宏观性的介绍与大量的基础材料。这两点均是开荒式著作或教材的主要特征,但这种写作方式在相对成熟的学术视域下,自然要被诟病。因此,开荒式著作的出场实要切中时机。《书于竹帛》在当时是西文世界关于中国印刷术发明前书籍史的第一本著作,又因其内容扎实,先天具有“开荒”的优势。从这个角度来分析,出版社对《书于竹帛》销量的低估,并非不认同该书的学术质量,也不是对目标受众群的误判,真正的原因恐怕是对受众群体数量的错判。

(2) 西方出版社和相关机构正在迅速积累与汉学著述相关的出版技术,形成相应的出版链条。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北美的出版链条正在逐步接纳东亚文字,解决带有汉字字符的汉学著述出版问题。如果说上文关于《书于竹帛》的汉字排印问题只能算个案,那么,在同一时期,哈佛大学出版社的相关工作则可称规模。费正清在回忆东亚研究中心的创办历时,着重提到哈佛大学出版社托马斯·威尔逊(Thomas J. Wilson)社长任内(1946年至1967年在任)对东亚著作出版技术的适应和接纳:

“我们东亚研究中心……的编辑能够校阅

汉字拉丁化的使用是否正确,并且能够指导编排中文、日文以及其他东亚语言的词汇表和参考书目。研究中心还提供了熟练的抄写员。哈佛出版社为此节省了不少为跨越太平洋两岸文字隔阂所需的费用。”^{[38]436}

可见,在私人基金会、研究机构对汉学著述的资助日益增多、读者市场与评论市场逐步扩大的大背景下,在堪称完备的西方出版链条中包容汉学图书出版的一些特殊性,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难题。事实上,英美现代学术出版机制和全球化的出版技术交流体系的存在,使得汉字字体从一个技术问题变成经济问题或时间问题。《中国乡村》付印中的中国字,本可在德国、日本或香港解决,只不过因为资费问题,未能谈妥^{[8]215},如果愿意,大可用“经济”换“技术”;而黄仁宇的《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 in Sixteenth-Century Ming China*)所采用的方案是从香港订字型,只不过因为寄错字型部首而延迟了出版时机^{[25]278},这一案例,则是典型的以“时间”换“技术”。

(3) 西方汉学研究的交流圈和评论圈正在迅速形成和扩大,为相关学术著作的完善、传播与销售奠定基础。《书于竹帛》在审稿阶段“偶遇”的杨联陞教授,恰是这一交流圈中的代表性人物。面对钱存训的著作,杨联陞给出了中肯的评价,对其缺点和问题,不是像汉考克般一语带过,而是逐一点出、以助改进。外界因杨的书评风格将他误认为“警犬”,但杨的自我定位实为“联络员”(Liaison)^{[40]iv},自谓以书评沟通研究之有无,对提升北美汉学研究具有不可推卸之义务,此处便是极好的例证。此外,在该书审稿、发行与排印、销售与反馈等环节,尤其是在《作者调查表》和《出版进度表》的名单和后续的系列书评中,更可以窥见这一正在扩大的交流圈与评论圈所发挥的作用。

概言之,20世纪50年代以后北美汉学研究的日渐兴起,汉学著作出版条件的逐渐完备,为《书于竹帛》的出版与成功奠定了关键的基础。

当然,还有许多其他重要的影响因素,如北美专业化学术出版流程的形成、芝加哥大学的特殊建制与1960年代前后作为北美图书馆学研究的黄金时代,等等,但将它们抽离并不影响我们对《书于竹帛》诞生过程的重构。反之,倘若忽视汉学研究兴起的话语背景,则《书于竹帛》的成功是难以理解的。

本文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档案为基础,全面回顾了《书于竹帛》第一版的出版过程,借此考察20世纪60年代北美汉学学术研究与著述出版的交叉与纠葛,简要地概括,即是:北美汉学研究的扩大为汉学著作的出版提供了诸多重要条件,而汉学著作的出版过程又加深了北美汉学界之间的交流与联系,促使学术共同体的形成;但由于此时出版社作为“中介”,尚未充分认识到北美汉学研究社群的扩大,又相继出现一系列“事件”,如对开荒式著作的理解偏差、对审稿人选择之迷茫、对图书出版销量预期之低估,等等。《书于竹帛》的诞生历程恰好为我们剖析以上事宜提供了生动而有趣的重要案例,可见其在学术价值之外,又另具一重“学术史考古”的载体价值。

在此基础上,文章更深层的目的,是通过《书于竹帛》窥见北美汉学学术史,进而指出另一种出版史与书籍史的写作可能。当前本领域对于图书与图书馆史的研究,多集中在人物思想与馆史编纂之上,这一点自无可厚非。但时近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对应的史学写作范式早就不该局限于微观史料的寻觅梳理(尽管这一点仍是地基)或是对各类“思想”“贡献”的刻板陈述。本文即尝试对关键文本与经典文本的诞生、出版与社会化展开贯穿式的考察,发掘书籍背后的时代起伏与智识世界。笔者将这种写作视为一种传承,是对刘国钧、钱存训、谢灼华、郑如斯、张秀民、王余光、程焕文等学者开创的书籍与印刷研究传统的延续,通过将图书史的研究置入宏阔的学术、经济与社会环境,试图为图书馆学争取跨学科的对话空间。图情领域的史学书写特点在于以书为媒、以文献为媒、以信息为媒,如何用书、文献和信息作为切入点,洞察诸般历史的发展与社会的脉络,积极地寻求思想互动与研究突围,正是未来一段时期本领域范式转型的关键所在。

参考文献

- [1] 肖鹏.民国时期中美图书馆交流史序说:研究综述、理论基础与历史分期[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8,44(3):96-111.(Xiao Peng.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library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literature review, knowledge base and the division of historical periods[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18, 44(3): 96-111.)
- [2] 钱存训.留美杂忆:六十年来美国生活的回顾[M].合肥:黄山书社,2008:53.(Tsien T H. The United States memories: a review of American life in past 60 years [M]. Hefei: Mount Huangshan Press, 2008: 53.)
- [3]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News Office. Obituary-Howard W. Winger [EB/OL]. [2018-07-15]. <http://www-news.uchicago.edu/releases/95/950307.HW.winger.shtml>.
- [4] Letters from Howard W. Winger to Carroll G. Bowen.1960-10-25[A].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Record 1892-1965, Box 464, Folder 3).
- [5] Letters from Herrlee G. Creel to Carroll G. Bowen.1960-10-27[A].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Record 1892-1965, Box 464, Folder 3).
- [6] Data about the manuscript [A].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Record 1892-1965, Box 464, Folder 3).

- [7] Press reader's report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0-11-02 [A].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Record 1892-1965, Box 464, Folder 3).
- [8] 萧公权. 问学谏往录 [M]. 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 1972. (Hsiao Kung-chuan. Biography of Hsiao Kung-chuan [M]. Taipei: Biographic Literature Press, 1972.)
- [9] 熊文华. 美国汉学史 (上) [M]. 北京:学苑出版社, 2015. (Xiong Wenhua.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Sinology [M]. Beijing: Academy Press, 2015.)
- [10] Letters from Carroll G. Bowen to Herrlee G. Creel. 1960-11-10 [A].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Record 1892-1965, Box 464, Folder 3).
- [11] Letters from Herrlee G. Creel to Carroll G. Bowen. 1960-11-16 [A].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Record 1892-1965, Box 464, Folder 3).
- [12] Letters from Carroll G. Bowen to Edwin O. Reischauer. 1960-11-18 [A].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Record 1892-1965, Box 464, Folder 3).
- [13] Letters from Glen W. Baxter to Carroll G. Bowen. 1960-11-25 [A].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Record 1892-1965, Box 464, Folder 3).
- [14] Letters from Carroll G. Bowen to Lien-sheng Yang. 1960-11-29 [A].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Record 1892-1965, Box 464, Folder 3).
- [15] Letters from Lien-sheng Yang to Carroll G. Bowen. 1961-01-10 [A].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Record 1892-1965, Box 464, Folder 3).
- [16] 杨联陞. 杨联陞日记 [A]. 剑桥: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图书馆馆藏影印本. (Lien-sheng Yang. Yang Lian Sheng Diaries [A]. Cambridge: Collection photocopy of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 [17] Reading Report by Lien-sheng Yang. 1961-01-06 [A].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Record 1892-1965, Box 464, Folder 3).
- [18] Letters from Carroll G. Bowen to Lester Asheim. 1961-03-21 [A].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Record 1892-1965, Box 464, Folder 3).
- [19] Letters from Carroll G. Bowen to Lester Asheim. 1961-04-07 [A].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Record 1892-1965, Box 464, Folder 3).
- [20] Letters from Lester Asheim to T.H. Tsien. 1961-04-10 [A].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Record 1892-1965, Box 464, Folder 3).
- [21] Letters from T.H. Tsien to Lester Asheim. 1961-04-13 [A].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Record 1892-1965, Box 464, Folder 3).
- [22] Letters from T.H. Tsien to Carroll G. Bowen. 1961-04-13 [A].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Record 1892-1965, Box 464, Folder 3).
- [23] Book Order. 1961-08-22 [A].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Record 1892-1965, Box 464, Folder 3).
- [24] CPI. About us [EB/OL]. [2017-12-02]. <http://www.cpi-print.com/>.
- [25] 黄仁宇. 黄河青山: 黄仁宇回忆录 [M]. 张逸安,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 278. (Huang Ray. Yellow river and blue mountains [M]. Zhang Yian, trans.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1: 278.)

- [26] Letters from Kendrick J Stark to John B Goetz.1961-05-25[A].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Record 1892-1965, Box 464, Folder 3).
- [27] Enclosures of the Letters from Kendrick J Stark to John B Goetz.1961-05-24[A].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Record 1892-1965, Box 464, Folder 3).
- [28] Letters from John B Goetz to Kendrick J Stark.1961-11-20[A].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Record 1892-1965, Box 464, Folder 3).
- [29] Publication Schedule.1962-07-25[A].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Record 1892-1965, Box 464, Folder 3).
- [30] Author Questionnaire. 1961-08-21 [A].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Record 1892-1965, Box 464, Folder 4).
- [31] Publication Schedule.1962-08-21[A].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Record 1892-1965, Box 464, Folder 3).
- [32] Letter from Marry Arthur to J. Trevor Brown. 1962-07-24[A].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Record 1892-1965, Box 464, Folder 4).
- [33] Letter from Anita Young to E.J.Brill. 1962-08-01[A].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Record 1892-1965, Box 464, Folder 4).
- [34] Letter from Anita Young to libraried'amerique et d'orient. 1962-08-01[A].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Record 1892-1965, Box 464, Folder 4).
- [35] Written on Bamboo and Silk.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Graduate Library School news bulletin[J]. 1962(27):5.
- [36] Invoices from Iriah Jefferson to Kline. 1963-01-23 [A].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Record 1892-1965, Box 464, Folder 3).
- [37] Book Review from LionelloLanciotti. The Library, 1963,14(12):128-129// The Library [A].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Record 1892-1965, Box 464, Folder 4).
- [38] 费正清. 费正清对华回忆录[M]. 陆惠勤, 等, 译; 章克生, 校. 北京: 知识出版社, 1991. (Fairbank J K. Chinabound: a fifty year memoir[M]. Lu Huiqin, et al, trans; Zhang Kesheng, proofs. Beijing: Knowledge Publishing House, 1991.)
- [39] 朱政惠, 崔丕. 北美中国学的历史与现状[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3:301-302. (Zhu Zhenghui, Cui Pi. Chinese Studies in North America: present and past[M]. Shanghai: Shanghai Lexicographical Publishing House, 2013:301-302.)
- [40] 杨联陞. 汉学书评[M]. 蒋力, 编.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6: iv. (Lien-sheng Yang. Book review of Sinology [M]. Jiang Li, ed.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6: iv.)

肖 鹏 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副研究员。广东 广州 510006。

陈润好 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广东 广州 510006。

(收稿日期:2018-08-18;修回日期:2018-10-31)